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 一个分析框架^{*}

□ 吴 双 王 勇

内容提要 平台经济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系统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以及相应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主张在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时，以纳入数据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强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由此内生决定的最优的生产结构也不同，故不同经济体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同。同时该框架提出“有效市场”需要与“有为政府”相协同，重视政府在推动平台增长、促进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以及完善平台监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平台经济 新结构经济学 要素禀赋结构 数据要素

作者吴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勇（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聘副教授。（北京 100871）

DOI:10.14167/j.zjss.2024.04.001

一、引言

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换道超车”的机会。其中，发展平台经济是发展中经济体实现“换道超车”的关键途径。^①在平台经济领域，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更在数据要素、人力资本和市场体量方面形成了潜在比较优势。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网民群体、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数据服务产品，集聚了海量数据要素，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数量众多。同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仅拥有最齐全的产业配套设施，还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这些优势结合起来为中国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规模优势与大国经济发展研究”(2023J2DZ01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研究”(23JZD011)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本文利用2022年World Bank, United Nations和CB Insights的数据测算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培育的独角兽企业中，平台企业所占比例为70.1%。

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林毅夫等，2021）为了将上述潜在比较优势切实转化为实在比较优势，本文将结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构建一个平台经济的分析框架，为中国抓住“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提供理论支撑。

已往文献大多认为平台是一种典型的双边市场，主要研究平台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促成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交易的问题以及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Rochet & Tirole, 2003; Armstrong, 2006）然而在现实中，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尤其是产业互联网平台）不仅是双边市场，更是集成了多重功能、能够同时为多边用户创造价值的演化组织，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平台重新组织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平台经济如何推动产业升级？已有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上述重要问题做出回答，这主要是因为各个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对于平台经济的依赖和需求存在系统性差异，^①从而导致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因此，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的主流文献存在着忽视了经济体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无法充分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平台经济发展现象。在此背景下，亟需对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构建有助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中国自主的平台经济理论体系。

有鉴于此，本文使用中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内生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影响的学说，倡导在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时不能从已有理论出发寻求解释，而是应该运用“一分析三归纳”的方法，充分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所谓“一分析”是指面对经济现象时，需要了解该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及其决策目标、决策者可动员的资源和面对的限制条件、可选的方案以及每个方案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从而推导出给定条件下可供决策者执行的最适宜方案。（王勇等，2022）“三归纳”则是指：第一，当代横向归纳法，即需要探讨不同经济体的相同现象背后的原因，探寻发展阶段的异质性对于某一现象的不同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第二，历史纵向归纳法，即根据同一经济体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重要现象的变化先后次序，探索现象发生的原因；第三，多现象综合归纳法，为了尽可能地提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排除内生性影响，还应该对一个经济体同时存在的多个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归纳出造成这些现象的共同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存在的现象。

相较于现有文献，新结构经济学在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一个经济体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由硬性的基础设施和软性的制度安排构成的各种复杂结构，它们全部由该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的、随时间变化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由于要素禀赋结构是动态调整的，且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出现了新的内涵，因此本文关注纳入数据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在平台经济研究中的起点位置。其次，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在给定时点上的最适宜的生产结构，由于不同生产结构下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均不相同，因而不同生产结构所对应的平台需求也不相同，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自然不同。最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前提，（林毅夫，2017）同一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或者同一时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平台经济发展所需的最适宜的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也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结合经济体的发展阶段、遵循比较优势，因势利导地对硬性的基础设施和软性的制度安排进行调整。

^①本文利用2022年World Bank, United Nations和CB Insights的数据测算发现：在北美地区，平台企业占独角兽企业的比例约为64.0%，而在南亚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平台企业被培育为独角兽企业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91.4%和90.6%。

总而言之，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平台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认识现实世界中以及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对于如何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提供了框架性的指导，并为更好地通过推动平台经济发展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平台经济的研究现状，并对与平台经济相关经验事实进行简单讨论；第三部分阐述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第四部分剖析政府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平台经济如何推动“有为政府”建设；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二、文献回顾

传统视角下的平台是双边或多边市场中的交易媒介，其核心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Rochet & Tirole, 2003) 在此过程中平台可以通过提高或者降低一边的价格改变交易量，或者通过减少卖方和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平台的用户则可以通过与另一方用户的交互获得价值。(Rochet & Tirole, 2006; Armstrong, 2006) 然而，经过20余年的发展，^①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对于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拓展内需市场以及促进不同环节、不同企业和不同行业的融通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对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借鉴管理学文献提出的平台生态系统概念，(马永开等, 2020; 杜勇等, 2022) 并且充分考虑中国在当前发展阶段下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数字中国建设主要方向的特征，^②关注平台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多边用户交易之外的要素配置、技术创新、价值共创等新功能。

传统视角下的平台本质上是消费互联网平台。由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已经跨过工业化阶段，西方经济学者很少关注互联网平台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问题。而新结构经济学则注意到中国工业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由“单一制造商”转向“制造+服务商”进行转型的典型事实，主张将侧重于价值共创的产业互联网平台纳入研究范畴，(马永开等, 2020) 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分为消费互联网平台和产业互联网平台。

不同视角下，平台经济的内涵也有所不同。作为双边市场，平台最重要的特征是网络外部性，(傅瑜等, 2014) 主要体现为平台所连接的一边用户的收益会受到另一边用户规模影响而导致的成员外部性，(Rochet & Tirole, 2006; Armstrong, 2006) 以及基于用户使用平台、分享数据等行为而产生的使用外部性。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平台呈现出边际成本递减的特征，直至其成本增长无限趋于零。(Katz, 2019) 而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平台所有者为双边用户提供增值服务能够提升双边用户匹配效率、满足买方多样化需求，并且有利于提高网络外部性的强度，(Bhargava & Choudhary, 2004) 因此搭售(Tying)也被认为是平台的重要特征之一，(Eisenmann et al., 2006) 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销售由实物产品和数据服务构成的“产品服务包”的新模式也被认为是实体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

通过对平台经济的内涵进行拓展，新结构经济学在开展平台经济理论研究方面也与传统视角的双边市场理论存在差异。归纳已有的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的双边市场理论主要聚焦平台定价问题，(Bhargava & Choudhary, 2004; Karle et al., 2020) 讨论平台将消费者有限的注意力分配给不同产品的方式以及平台在帮助消费者找到最偏好产品的同时，增加厂商降价激励的微观机制。

①一般认为，2003年上线的“淘宝网”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平台。

②《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将“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列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

(Dinerstein et al., 2018) 随着平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的出现，部分文献进一步注意到平台和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康俊卿等, 2022) 少数学者试图探讨平台与生态系统进行交互的方式以及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Zhu & Iansiti, 2012; 刘江鹏, 2015; 万兴、杨晶, 2017; 马永开等, 2020) 但是这些研究整体上仍然集中于微观层面，或聚焦于单一类型的平台，(Clarke et al., 2015; 杜勇等, 2022) 或忽视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发展阶段的差异，直接将结论一般化于所有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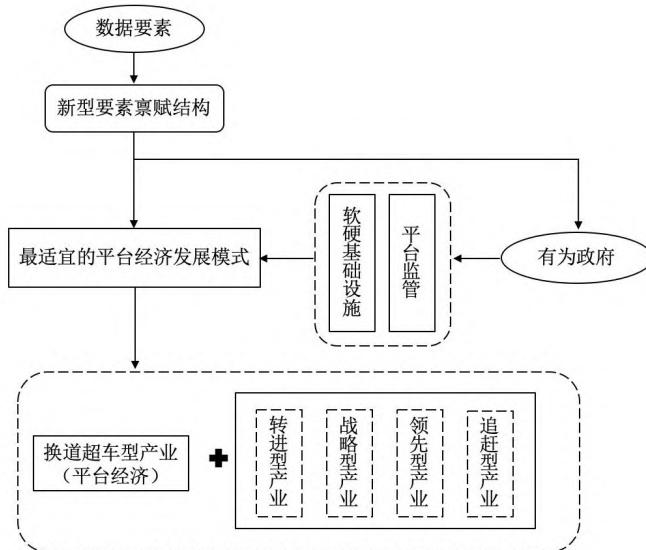


图1 新结构经济学分析平台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目前关于平台经济的研究进展要滞后于平台经济的现实发展，在内容上和视角上均存在局限性。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在讨论平台经济最适宜的发展模式与政策安排时，总是假设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路径就是其他经济体应该效仿的最优模式，忽视了不同经济体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差距所导致的平台经济发展差异。因此，为了进一步理解平台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于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或国家制度为潜在背景的现有平台经济理论，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时应当立足于本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特征，以纳入数据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起点，讨论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并提出市场有效应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应以市场有效为依据，(Lin, 2012) 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在平台经济发展中的因势利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运用“一分析三归纳”的研究方法，对平台经济的重要现象进行探索。

三、平台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一) 逻辑起点：纳入数据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以要素禀赋结构为核心的研究范式。(林毅夫, 2011) 对于任一经济体而言，一切复杂的结构全都内生于该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给定的、但是会随着时间变化动态调整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随着经济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发生

变化，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生产结构也会动态演化。（Ju et al., 2015）例如，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力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而随着经济体的不断发展，资本不断积累，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涨，资本的相对价格下降，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动态调整，即劳动力会从相对丰裕转变为相对稀缺，而资本则从相对稀缺转变为相对丰裕，故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相应地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逐渐转变为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

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每一次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都伴随着新型生产要素的诞生。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的成本不断降低，并在经济活动中呈现出低边际成本、无损耗、易复制的特征，数据成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而在平台经济中，平台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数据展开。（Peteraf, 1993）数据不仅是当前互联网平台的核心资产，（Dinerstein et al., 2018）还是平台经济中的关键生产要素，（Katz, 2019; Dinerstein et al., 2018）对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平台效率的提高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纳入了数据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为逻辑起点展开平台经济研究。

（二）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由此内生决定的最适宜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也不同。由于不同产业使用不同的生产技术、具有不同的相对要素密集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在产业规模、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的特性都是不同的，其对于增长路径的选择存在系统性差异，对于平台功能和效率的需求也会不同，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也就不同。因此，在分析平台经济的问题时，新结构经济学主张首先要对经济体的发展阶段有所认识，给定一个经济体以及该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在所有可能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中，能够以最小的“扭曲”实现最快速的增长，并且能够最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和运行的模式。如果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偏离经济体中产业对于平台经济的需求，那么发展中经济体就无法利用平台经济进行“换道超车”。

从本质看，数据要素是一种信息资产，（Jones & Tonetti, 2020; Farboodi et al., 2019）由于不同产业、不同价值环节对于信息效率和信息安全的需求不同，数据要素具有结构性特征。为了能够在相同的理论框架内分析不同环节、不同产业的要素禀赋结构，新结构经济学倡导利用“五大类产业”分析平台经济问题。根据一个产业和世界前沿的差距、符合比较优势的程度以及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周期等标准，可以将产业分为五种类型：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换道超车”型产业和战略型产业。其中，平台经济是典型的“换道超车”型产业，而其他四类产业则可以通过与平台经济进行融合而实现转型升级。不同类型的产业对于平台经济的需求具有异质性，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也会不同。例如，汽车制造业是标准的追赶型产业，但是与平台经济结合发展车联网却可以为中国汽车制造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带来机遇。又比如，领先的家电制造业则可以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的位置，针对用户需求开展个性化大规模定制，从而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因此，如何利用平台经济缩短追赶型产业的创新周期、保持领先型产业的长期优势、提升转进型产业的竞争力、培育战略型产业的自生能力，是新结构经济学在研究平台经济时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平台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在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同，平台经济对于实体经济

的影响和作用路径也会不同。在某一发展阶段，平台经济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否与同一发展阶段实体经济的生产结构相符，因此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平台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数据要素的不断积累，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要素密集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动态调整，并改变不同产业的生产成本，推动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发生变化。（Ju et al., 2015）如果对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纵向对比，还可以发现，随着一个经济体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要素的不断积累，当要素禀赋结构调整到一定水平时，还会进一步出现产业升级甚至诞生新的产业，（王勇、沈仲恺，2018）五大类产业的属性也可能出现转化，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也会变化。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不仅从横向角度关注不同经济体各自最适宜的平台发展模式，还从纵向角度关注同一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中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相应的系统性差异。

四、政府在平台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一）“有为政府”

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生产要素不断积累和迭代的过程。随着数据成为一种现实的生产要素，要素禀赋结构出现了新的内涵，经济体最适宜的生产结构很可能会偏离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情况，此时如果不对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进行相应调整、持续识别和解决制约需求增长的问题，则平台经济就无法顺应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实现进一步增长。因此，当平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落后”和“扭曲”时，就需要政府部门结合经济体的发展阶段，通过调整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遵循比较优势，因势利导地支持平台经济发展，进而才能够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生产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而变化。

在“有效市场”中，要素的相对价格能正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进而使得企业能够根据价格信号进行正确的生产决策。然而，由于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平台市场可能会出现价格机制失灵的问题。造成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包括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制度环境恶劣等，因此企业无法独立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在私人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成本较高且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例如，平台建设（尤其是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往往需要支付高昂的固定成本，即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平台运营的边际成本可能无限趋近于零，（Katz, 2019）企业也可能由于进入平台市场的总成本过高而选择退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私营部门在提供基础设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出现基础设施瓶颈。（Lin, 2013）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提高平台经济的运行效率不仅依赖于市场主体，还依赖于“有为政府”的推动和治理。（林毅夫，2017）“有为政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Donaldson, 2018；Banerjee et al., 2020）为实体经济与平台经济深度融合扫清障碍。

“有为政府”在纠正平台市场失灵、促进平台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马述忠、房超，2021）已有研究往往将经济体中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作为外生给定的参数，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关注内生的基础设施，主张给定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后，平台经济在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强度由各种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决定。而一个经济体的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都是内生的。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由此内生出来的生产结构不

同，不同产业所面临的交易成本不同，与之相适应的硬性的基础设施和软性的制度安排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战略型产业和转进型产业对于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性的要求有明显差异，领先型产业和追赶型产业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安排也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因此，平台经济中的“有为政府”需要根据不同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约束，制定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特别是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实体经济产业的特性提供相应的措施，（田鸽、张勋，2022）引导产业结构转型有序推进。

若政府能实施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平台发展战略，同时不断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会进一步提高本土产业的竞争力，获取更多的经济剩余，要素禀赋结构变迁的速度也会加快。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展中经济体在发展平台经济时，违背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比较优势，盲目实施赶超战略，会导致平台市场“扭曲”和平台运行效率的下降。这是因为在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下，要素价格体系不能充分反映要素禀赋之间的相对稀缺性，从而也不能反映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生产结构对于平台经济的真实需求，平台经济无法以最适宜的发展模式提供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平台市场会出现“扭曲”，导致相关企业也缺乏自生能力，所以政府部门必须以各种行政手段来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不能精准配置硬性的基础设施和软性的制度安排，进而导致平台经济运行效率低下。

（二）平台监管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是指给定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平台经济，这以充分竞争的平台市场为制度前提。因此，当平台市场出现垄断时，要素的相对价格无法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将出现“扭曲”。由于网络外部性在提升平台匹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平台垄断势力的出现，（Kirpalani & Philippon, 2020；苏治等，2018）因此为了遏制平台垄断趋势、规避可能出现的“扭曲”和其他风险、降低数据确权不清晰导致的消费者隐私受到侵害等社会福利损失，从2020年开始，我国平台市场开始进入整顿监管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依法依规加强互联网平台经济监管，明确平台企业定位和监管规则，完善垄断认定法律规范，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门发布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平台监管的力度进一步加强。

大量文献研究了平台经济中的的垄断现象（Evans, 2003；傅瑜等，2014）和消费者隐私问题（Jones & Tonetti, 2020），并提出了政府治理和平台监管的相关建议。然而，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能高估政府在矫正平台市场失灵时的作用。同时，政府对于平台经济的不当干预也对平台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限制，造成了生产要素不能以最优规模投入使用的问题，进而导致平台市场的无效率和“扭曲”。针对平台监管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主张首先需要确定给定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优生产结构以及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找到现行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与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不一致的原因，确定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和制度安排。

平台监管是政府介入平台经济发展、提升平台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方式，需要与平台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性相适应。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在对平台监管的过程中也应遵循比较优势，根

据平台经济本身的特性、不同的产业特性、平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特性，设计良好的交易机制与产业政策平衡福利目标，因势利导地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的协同，切勿以“一刀切”的监管制度安排或者激进处理方式对平台市场造成过度干预。

（三）政府效率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和数据要素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不仅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徐朝阳、林毅夫，2010）还会反作用于政府部门的运行效率。（谭松涛等，2016；王勇等，2022）一方面，平台经济能够帮助政府部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从政府公共政策、政务服务市场、政务公共数据、政府应急管理等多个方面促进政府效率提升，从而有助于政府更加准确地把握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建立能够缓解资源配置扭曲问题、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政府的治理能力往往内生决定于给定发展阶段时特定的、但会随着不同发展阶段动态调整的要素禀赋结构。在平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数据要素不断积累，此时即使采用了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平台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效率还会受到动态调整的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因此，如何利用平台经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推动“不作为政府”向“有为政府”转变，进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在平台经济领域重要的研究方向。

五、结语

本文首次系统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并提出了相应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在对平台经济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时，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主张以纳入数据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起点。数据是平台经济中的关键生产要素，将数据要素纳入要素禀赋结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至今的必然结果。而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一切复杂的结构全都内生于该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给定的、但是会随着时间变化动态调整的要素禀赋结构。第二，强调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内生决定于经济体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由于同一时点上的不同经济体或者同一经济体在不同时点上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生产结构不同，实体经济对于平台经济的依赖和需求存在系统性差异，对应的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也会不同。第三，关注平台经济和“有为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有为政府”可以通过动态调整与新型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的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因势利导地支持平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应用平台经济，政府部门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资源配置扭曲问题，实现从“不作为政府”向“有为政府”的转变。

基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未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可以在以下两个方向施力：一个方向是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为研究起点，填补现有平台经济文献中的空白领域。例如，现有文献中关于产业互联网平台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较少，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问题：给定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追赶型产业和转进型产业如何通过平台化转型实现“换道超车”？对于领先型产业而言，进行平台化转型会放大还是会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型产业应该如何与平台经济融合，从而加快国产替代？又如，现有文献缺乏对于不同经济体、不同发展模式的平台经济的比较分析，但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可以通过构建多国、多部门的理论模型，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另一个方向是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独特的分析框

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方法上和视角上的补充。例如对已有平台经济理论进行多要素、多部门的拓展，将要素禀赋结构嵌入经典的微观模型等。特别地，近年来中国关于平台经济的政策逐步收紧，但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进一步提出能够平衡平台增长和平台监管的最适宜制度安排。总而言之，希望本文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为相关学者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提供参考和启示。

参考文献：

1. 杜勇、曹磊、谭畅:《平台化如何助力制造企业跨越转型升级的数字鸿沟?——基于宗申集团的探索性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
2. 傅瑜、隋广军、赵子乐:《单寡头竞争性垄断:新型市场结构理论构建——基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考察》,《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期。
3. 康俊卿、曾燕、陈夙雨、王勇:《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的电商平台应对举措——论电商平台救助入驻企业的最优策略与救助效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2期。
4. 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5.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
6. 林毅夫、王勇、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研习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7. 刘江鹏:《企业成长的双元模型:平台增长及其内在机理》,《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6期。
8. 马永开、李仕明、潘景铭:《工业互联网之价值共创模式》,《管理世界》2020年第8期。
9. 马述忠、房超:《跨境电商与中国出口新增长——基于信息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双重视角》,《经济研究》2021年第6期。
10. 谭松涛、阚铄、崔小勇:《互联网沟通能够改善市场信息效率吗?——基于深交所“互动易”网络平台的研究》,《金融研究》2016年第3期。
11. 田鸽、张勋:《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管理世界》2022年第5期。
12. 苏治、荆文君、孙宝文:《分层式垄断竞争:互联网行业市场结构特征研究——基于互联网平台类企业的分析》,《管理世界》2018年第4期。
13. 万兴、杨晶:《互联网平台选择、纵向一体化与企业绩效》,《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7期。
14. 王勇、樊仲琛、李欣泽:《禀赋结构、研发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
15. 王勇、沈仲恺:《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16. 徐朝阳、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17. Armstrong 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37(3): 668~691.
18. Banerjee A., Duflo E. & Qian N., “On the Road: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0, 145(6): 102442.
19. Bhargava H. K. & Choudhary V., “Economics of an Information Intermediary with Aggregation Benefit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4, 15(1): 22~36.
20. Clarke G. R. G., Qiang C. Z. & Xu L. C., “The Internet as a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Around the World”, *Economics Letters*, 2015, 135: 24~27.
21. Donaldson D.,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4~5): 899~934.
22. Dinerstein M., Einav L., Levin J. & Sundaresan N., “Consumer Price Search and Platform Design in Internet Commer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7): 1820~1859.
23. Eisenmann T., Parker G. & Alstyne M. W. V., “Strategies for Two-Sided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 84(10): 92~101+149.
24. Evans S. D., “Some Empirical Aspect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Industries”, *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 2003, 2

(3): 191~209.

25. Farboodi M., Mihet R., Philippon T. & Veldkamp L., “Big Data and Firm Dynamics”,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9, 109: 38~42.

26. Jones C. I. & Tonetti C., “Nonrivalry and the Economics of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 (9): 2819~2858.

27. Ju J., Lin J. Y. & Wang Y., “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5, 76: 244~263.

28. Karle H., Peitz M. & Reisinger M., “Segmentation versus Agglomeration: Competition Between Platforms with Competitive Sell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6: 2329~2374.

29. Katz M. L., “Platform Economic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19, 28(1): 138~152.

30. Kirpalani R. & Philippon T., “Data Sharing and Market Power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NBER Working Paper*, 2020.

31. Lin J. 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Washington: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2.

32. Lin J. Y., *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3. Peteraf M. A., “The Cornerston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Resource-Based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14(3): 179~191.

34. Rochet J. C. & Tirole J.,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 1(4): 990~1029.

35. Rochet J. C. & Tirole J.,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37(3): 645~667.

36. Zhu F. & Iansiti M., “Entry into Platform-Based Market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33(1): 88~106.

责任编辑 张翔宇

ABSTRACTS

An Analytic Framework on the Platform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4)

Wu Shuang, Wang Yong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platform econom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attracts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nalytic framework on the platform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We argue that the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nalysi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optimal production structure determined by the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is different, so that the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mode of plat economy is also different. Finally, effective markets need to be coordinated with proactive governments. Governmen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facilitating platform growth,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and improving platform regulation.

Key words: platform econom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data fact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arket Efficiency and Allocation of Credit Resour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14)

Zhang P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 'An Shiyou University, Xi 'An 710000*)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premise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credit resources. This article aims to incorporate implicit government guarantees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market effectiveness on credit resource al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dynamic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When the market is not efficient enough,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redit resource allocation; When the market is sufficiently efficient, the allocation of credit resources should be led by the market.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mplicit government guarantees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ost of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and market efficiency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in this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implicit government guarantees can als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redit resource alloc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nerg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Key words: implicit government guarantee; debt financing cost; credit allocation efficienc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